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ZHONGGUO MAKESI-ZHUYI YANJIU CONGSHU

艰难变革

——“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

杨起予 著

JIANNAN BIANGE

ZHONGGUO DAOLU DE SHIJIAN SHENGCHENG YANJIU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ZHONGGUO MAKESI ZHUYI YANJIU CONGSHU

艰难变革

——“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

杨起予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难变革：“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 / 杨起予

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8.5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1365-7

I. ①艰… II. ①杨…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8235 号

责任编辑 许钧伟

特约编辑 张龙华

封面设计 周剑峰

艰难变革

——“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

杨起予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365-7/D·48

定 价 63.00 元

总 序

方松华

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以来,本所的同仁一直怀着一颗壮志雄心,希望从“学术系统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建构”“国际比较的视野”与“学术档案的确立”五个方面来建构一个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酝酿、撰写并出版多卷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乃是这种心愿和如下使命所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理论和学术的主流,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道统”。它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之理论基础的意义上已经成为潜在地支配或影响当今中国历史走向的新的思想或精神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方面作为学术史、思想史或精神史,它所反映的是现当代中国由民族走向世界史的过程中,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互交流、碰撞、矛盾、冲突和融合中,参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与政治和社会运动高度相关的理论史或意识形态

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一恢弘的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法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理论主题,它的发展水平、理论境界和历史视野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状况、历史远景和未来前途,关系到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对于古今中外问题、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解答。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筚路蓝缕,共启中国学术之山林。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一直到五四时代,传统儒学受到致命打击,遂有多元学术思潮之兴起。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十余种学术思潮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荣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应对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成功应对了来自中国传统和保守势力的挑战,承担起近现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二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苏联道路或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的挑战,在艰辛探索中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三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信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之一,就是在与当代各种学术思潮和思想流派的充分对话中,实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理论建构,让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中国的理论元素、理论经验和理论内容,从而构建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自我辩护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

从学理方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学术史在中国传统中有着“道(原理)与术(运用)”的意蕴，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有着自身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传播与确立；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 20 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绵延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论战，无论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还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抑或是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伟大思想、西方优秀的现代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智慧相融合，创造性地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

二

当代中国，各派学说纷纭、各种思潮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这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

考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学术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不足,在学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更不用说“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在学术话语的思想内涵的建树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大多是模仿或引进西方模式,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曾经非常努力地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可惜大多没有成功,其原因也是在于没有确立中国本土的话语系统。因此,如何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和实践话语以学术话语的形态,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更深刻的学理支撑,并转化为日常话语提供中介,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我们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进的基本经验、教训和路径进行探索:(1) 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提炼总结和对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极影响的反思。(2)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辨:特别要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其他学科学术话语、实践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3)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路径探索: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影响力;以求得话语批判和吸收借鉴的结合;内在理路和外在形式的统一。由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 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这无疑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大机遇,其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艾思奇、冯友兰、冯契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何其芳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孙冶方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成绩。这些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一道,共同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个时代的巨大主题。

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回顾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着不同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学科体系或知识建制(苏联模式),各门学科都形成马克思主义原理性质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原理性的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的)解体,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马克思主义被设定为基础性的学科门类,引领并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但是,学科建设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探索:(1)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性地位,需要重点考察这种指导性地位产生的历史缘由和内在的合理性;(2)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科之间的具体关联研

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宗教、文艺、历史以及其它具体学科的发展要求相结合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3)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具体关联研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发展相结合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以及所遭遇的重大学术困难;(4)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学科化努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需要重点考察延安时期、建国初、改革开放后,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自身体系化和学科化的种种努力、成就和经验教训。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歧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由国际视野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热议、争论、评判和反思,已经成为当前各主要思潮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重心之一。对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要左翼思潮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想,信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人类文明样式。为此,我们应当拓宽理论视野,将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关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史和改革史的研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体制和中国模式的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从外部世界来对照、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过程。

五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亟需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资料长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学术论战、重要学术文本汇编成经典史料,用纸质和数据库的形式面世,尽快抢救许多散落和佚失在解放前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资料。以求为今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学术史奠定比较丰富可靠的史料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第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学术基础。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发掘学术资源的层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根本主旨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发掘的意义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可以为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学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与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创造力的根本体现——有着本质性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坚实思想和学术基础。

第二,研究和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史的地位,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掘与建构,填补这一近乎空白的领域,更是为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盛事,这就像中国先哲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是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或新“道

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是以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为现实依托的，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的历史和思想传统，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道统”，当代中国所折射的诸如古今问题、中西问题、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都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和思想传统中得以展现和解答，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就是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传统或新“道统”。

第三，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比以往经验的阐释更进一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旨在从学术系统、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国际视野等方面来对这一论断进行阐述和论证。

第四、可以在思想和学术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积累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如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揭示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破解“历史终结论”，为中国和未来世界开辟新的发展愿景。

目录 | Contents

引 言	001
一、研究综述	002
二、研究框架与内容	016
第一章 改革肇始：起于上层的重心转移和来自底层的人民力量	023
第一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	023
第二节 改革过程中的自发和自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031
第三节 乡镇企业和农村的工业化过程	043
第四节 民营(私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047
一、民营(私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缘起	047
二、对于民营(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历程	055
三、民营(私营)经济和社会主义	060
第五节 改革在延伸中的深化	067
第二章 渐进的开放：从逐步引进到自觉走向世界	079
第一节 开放的缘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	079
第二节 深圳经济特区的典型意义	084

第三节 开放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088
一、全面引进外资	088
二、体制与接轨	093
三、在互利共赢中走向世界	100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既定方向	105
第一节 “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和内涵	105
一、“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	105
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	108
三、“四项基本原则”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理论和历史	112
第二节 改革引发的争议和邓小平“南方谈话”	116
一、改革深化过程中引发的起伏和争议	116
二、走出争论：邓小平“南方谈话”	118
第三节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同一性	124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内含的“四项基本原则”内容	124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128
第四章 现代化转型中的时代变迁和理论创新	133
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33
一、邓小平所面临的时代	134
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前提和实质内涵	138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变迁与“三个代表”	153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153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贡献	156
第三节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科学发展观”	163
一、改革面临的矛盾和科学发展观	163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贡献	171
第四节 习近平的贡献：从深化改革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176
一、在深化改革中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学说	176
二、中国梦和“中国道路”	183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民主体性	204
第五章 回望历史：“中国道路”的源远流长	20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的历史选择	210
一、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1919—1921)	210
二、五四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21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22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223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体制的现代变迁	231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	234
结 语	243
参考文献	247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①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变化。其中尤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所表现的具体性和可见性而格外引人注目。因此,面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国外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来对应和解释。这个概念的本质,是指以中国为主体的一种不同于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路径。由此引出的思考,实际上牵涉到了当代思想、政治和社会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发展道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因为“中国模式”最先是与“北京共识”一起提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照和对比的,因此而带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有时候反而掩盖了其更深一层的真实内容,国内学者遂将“中国模式”一词替换为“中国道路”或是“中国经验”、“中国路径”等提法,以弱化和减轻其外在的意识形态化。所以,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其实与“中国模式”有着直接关联,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之后才开始出现,并因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受到关注的。因此,它直接反映和对照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

① 以实际时间推算,改革开放至今已近四十年,但“三十多年”的说法一直为学界沿用,尤其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讨论影响深远。因此本书一般仍循三十多年之说。

一、研究综述

“中国道路”一词是由最初的“中国模式”转变而来的。“中国模式”一词源于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文章。作者在该文中指出，中国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积极开拓，立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步一步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并称之为“北京共识”。此后，关于“北京共识”能否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和争论便成了一种思想现象。几年之前，“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更具理论形态的概念，成为“北京共识”的代名词。之后，国内学术界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进行了更多样化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共识”通常是指一种广泛认同的解决方案，而“模式”一词则更多地与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制度、理念和发展战略相关联。由于“中国模式”蕴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内容，是在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过程中逐步产生的，因而无须外界形成共识。于是，学术界相继出现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路径”等概念，以此替代原先的“中国模式”。相对于“中国模式”、“中国路径”和“中国经验”，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中国道路”这一提法，因为这个概念更能彰显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恢宏历程的历史性、探索性和实践性。

时至今日，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都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就专著而言，比较重要的有：托马斯·海贝勒的《中国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胡鞍钢的《中国的位置》与《中国崛起之路》、黄亚生的《真实的中国》、胡伟的《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基辛格的《影子中的中国》、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王绍光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张维为的《中国震撼》、吴敬琏的《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潘维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时

代的中国》、张冠梓主编的《哈佛看中国》系列、傅高义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和《邓小平时代》、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等。就论文而言，比较重要的有：吴敬琏的《“中国模式”应思考的问题》、俞可平的《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分析》、宋鲁振的《东西对比：西方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制度危机》、孙岩峰的《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唐士其的《“中国模式”不可能“去政治化”》等。在诸多海内外已有的研究中，研究重点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研究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认为：“确切地说，中国当代社会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而这次会议又是和邓小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其实，他的活动一直伴随着共产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①他同时指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中国之所以一直坚持改革的渐进方法，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亲眼目睹了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方案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他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方案：一是中国政府强调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诠释；二是中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富足的劳动力可以使她通过‘正常发展’获得较高的增长，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不可能在转型中通过再雇佣农村劳动力来支持工业化进程；三是冷战结束后，生产武器的军事部门和产业比重逐渐减少，这种情况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使得较多的支出转向了制造业和重工业部门，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也有不同。”^②

① 托尼·赛奇、张冠梓：《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张冠梓：《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托尼·赛奇、张冠梓：《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张冠梓：《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0页。